

国際フォーラム

東日本大震災とその後——災害・復興・防災の日中比較を通じた新しい社会の模索

主催：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中社会学会

会場：北京外国語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

日時：2011年9月10日9:00-12:30

司会：宋金文：北京外国語大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首藤明和：兵庫教育大学准教授

発言者：

中国側：

徐一平：北京外国語大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高建国：中国地震局地質研究所・研究員

王志秋：中国地震局震災救援司緊急救援処・処長

伍国春：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工程地震学与城市減災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文 俊：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マスメディア研究・副教授

周维宏：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室・教授

日中社会学会：

陳 立行：関西学院大学教授

西原 和久：名古屋大学教授

坪谷欧美子：横浜市立大学准教授

長田 洋司：内閣官房内閣室広報調査員(元在上海日本国総領事館専門調査員)

出和 暁子：南開大学専任講師

宋金文：

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冒雨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今天是中国教师节，后天是中秋节，在这里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大家放弃与亲人团聚的时间来参加我们座谈会，在这里向大家表示感谢，同时也对不辞辛苦千里迢迢从日本来参加会议的日方专家也表示感谢！这次座谈会由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和中日社会学会联合主办，我是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宋金文，今天的会议由我和首藤老师一起主持，下面首先介绍一下参加座谈会的成员，先介绍一下中方成员，他们是国家地震局地震研究所高建国研究员，国家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救援处的王志秋处长，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伍国春副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文俊副教授。

首藤：では引き続きまして日本側の参加者をご紹介します。日中社会学会会長陳立行先生、名古屋大学教授西原和久先生、横浜市立大学准教授坪谷美欧子先生、在上海日本国総領事館専門調査員長田洋司先生、南開大学講師出和晓子先生です。

宋金文：下面请徐一平老师和陈立行会长致词。

徐一平：今天来参加座谈会的各位老师，大家好。

正像刚才宋金文在开头讲的那样，这次大家在百忙之中，特别是在中秋节連休三天的第一天，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而且今天外面还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来参加我们第一次座谈会，我代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也对日中社会学会陈立行会长和首藤老师，这次能和我们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合作举行系列座谈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大家也知道，明天是九月十一号正好是“3.11 大地震”发生整整半年的时间。这次日本的“3.11 大地震”再加上海啸和核泄漏，给日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此我也想对在此次灾难中遇难的日本包括其他国家的同胞，而且至今据说还有很多下落不明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今天早上来之前我也看了电视新闻，中国的电视也报道了中央电视台记者近期对日本现在的环境及核事故担当大臣进行采访的新闻报道。中国的新闻记者问到了现在核电站的冷停堆的情况，目前还有什么困难，细野大臣讲如果要实现冷停堆的话，至少核电站温度要降到一百度以下，而且核泄漏要得到控制，那么现在日本还要安装很多设备，目前看来还是有很大困难，而且据说为此花费的资金要达到一万亿日元。但是即使是这样，日本还是表示下决心，希望在今年的十二月到明年的一月来实现冷停堆的目标。也就是说，日本“3.11 大地震”所造成的影响还远远没有停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来召开座谈会，而且是一个系列座谈会，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作为我本人来讲，虽然我没有经历“311 大地震”的当天，我想在座的有很多日本人可能都经历了。但是我是在地震的第二天正好去东京外国语大学出席一个研讨会，所以也经历了当时的余震还有核泄漏事件所造成的計画停電、节电，包括初期的一些恐慌的情况。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个恐慌进一步给中国、韩国乃至世界也都带来了影响，因此我们选择的《从“3.11 大地震”及其以后的社会探索》这样一个课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受到关注的。

大家也知道，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今年除了“3.11 大地震”以外，前不久还发生了大型台风，对关西地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不仅今年是发生了大地震，大家也知道 1995 年 1 月 17 日还发生了“阪神大地震”，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因此日本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许多研究，有许多防灾、地震的对策，甚至震后恢复的很多的经验。中国实际上也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1976 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2008 年我们也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所以在地震灾害对应方面，日本有许多经验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在这方面，我们日研中心到目前为止也做过一些工作，今天我带来了两本书，实际上也是我们社会研究室宋金文老师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一个是日本内阁府编的《灾后恢复与重建实施手册》，这个是我们和清华大学一起编译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和日本的神户大学合作的。神户大学对 1995 年的

“阪神大地震”进行了十年的研究，我们结集了研究的成果中对中国有意义的部分，出版了《日本阪神大地震研究》这本书。我想这些工作都会对今后中国的防灾救灾有很多的借鉴。

但是，今年日本的“311大地震”不光是发生了地震，而且在地震的同时发生了海啸，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核泄漏这样一种三重的灾难，所以它的影响可能会更大，而且不光会影响到日本，还会影响到亚洲乃至全世界，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这次和日本的日中社会学会组织这样一个系列座谈会，旨在座谈框架中提到的内容，我们希望通过与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灾难灾害、恢复重建、防灾体制等等方面进行中日比较，希望从东日本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与中日社会应对机制、社会结构的特点的方面来进行中日比较。我们和陈立行会长商量，这个系列座谈会我们准备搞三次，除了今天以外，我们还准备在十二月、明年的三月举行。

除此以外我想向大家预告的是，我们中心也做了一些其他的安排。除了这个座谈会以外，我们中心在这学期的公开讲座也安排了四次都是以这次的东日本大地震为内容的讲座。我们第一次将在九月二十二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高宏教授来给我们从日本“3.11大地震”后政局动荡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进行报告；第二次在十月二十七日，由我们现在日方主任教授、日本立教大学的笠原清志先生就东日本大地震所带来的日本社会构造的变化来进行报告；第三次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张文颖老师，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谈大江健三郎的反核思想，因为这次核泄漏也造成了对核能源和平利用等方面的许多反思；第四次将由今天在座的日本地震局的伍国春女士就灾害社会学与日本研究，以东日本大地震为例来进行报告。所以我们的公开讲座也是和这个内容紧密相结合的。另外，我们还策划聘请日本的组织学会会长、日本东京大学的藤本先生在十二月也配合我们这个座谈会搞一次主题演讲，他的题目是“从东日本大地震看全球化社会及风险管理”，以上这一系列活动都和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紧密相关。

同时我还要向大家预告，当然日本也非常关注这个事情，我们日研中心参与的去年和韩国、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共同策划的一个东亚日本研究论坛，去年是在韩国济州岛启动的，这个论坛将在韩国、日本和中国系列搞下去，今年是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来承办，国际交流基金的小川忠部长提议，今年的这个东亚日本研究论坛也将以东日本大地震为题目，而且预定十二月十号在日本的仙台举行。

我想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座谈、论坛、研讨以及报告等，能够深入研究地震乃至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给当今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我们人类社会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一系列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像核泄漏这样的可能很多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我想我们这个座谈会也是这一系列研究中的一环，所以我也非常期待与日中社会学会陈立行会长还有首藤老师这样的合作能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最后，期待今天的座谈会乃至今后一系列的座谈会和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再一次对今天来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各位代表以及来旁听的各位其他学校的老师和我们的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陈立行：

我是中国人，中文是我的母语，我用中文更方便。首先我非常感谢日本学研究中心在筹备研讨会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今天是中国的中秋节，是中国家庭团圆的日子，但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会议，感到非常温暖。

下面我对日中社会学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日中社会学会是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福武直先生发起成立的。福武直在日本社会学界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费孝通先生。现在他已经去世了，当时是东京大学的教授。80 年代在日本搞中国研究的社会学者很少，出现了断层。福武直先生呼吁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日本的社会学界一定要关注中国，了解中国社会的动态，从 80 年代初就多次访问中国开始筹建日中社会学会。学会成立初期会员只有五十人左右，经过 30 年的发展，这个学会的会员已经超过 250 人，在日本研究海外学会中规模最大。日中社会学会不仅培养了很多研究中国社会的日本学者，也培养了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在座的伍国春老师在名古屋大学留学时就是我们学会的成员，经常参加我们学会的活动。我是去年被选为日中协会的会长，是这个学会的第一任外国人会长。

3.11 大地震引起世界的关注，在全球化的时代，各种危机以及自然灾害已经不是对某一个国家的威胁，是对全人类的威胁。需要各国，各个领域的共同研究。面对自然灾害和各种危机，中国和日本有很多共同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互相借鉴。所以，非常感谢日本学研究中心大力协作。这次研讨会只是第一次，到明年 3 月份我们共同策划了三次国际研讨会。衷心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合作，加深日中两国社会的相互理解，找出抵御现代化灾害，抵御自然灾害有效的社会机制。

宋金文：

日本 3.11 大地震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影响。2008 年汶川大地震也给中国造成了重创，经过三年艰苦的恢复工作，目前重建工作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了。其中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探讨。今天我们请中日双方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谈谈中日两国在地震救灾以及重建家园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一个目的就是相互学习和借鉴，通过灾害、恢复重建以及防灾等方面的比较，加深对地震本身的认识，同时也提高我们今后应对灾害的水平 and 能力，为今后中日双方防灾体制建设和制度建设做出贡献。这是我们会议的主旨。

下面先请各位发言人结合自己的工作以及对 3.11 大地震或者汶川大地震以后大家对灾害整体的看法和评价，对自己关注的问题进行介绍，每个人发言五分钟。然后再就大家提出的问题 and 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具体发言顺序按中方、日方轮流交叉进行。下面先请首藤明和先生发言。

首藤明和：

私は、1995 年、阪神淡路大震災が発生した時には神戸大学にいました。徐一平先生が紹介して下さったこの神戸大学による震災復興研究の成果ですが、私自身も大学院生

のときに参加しております。1年間ほど、被災地の復興、まちづくりについて調査をいたしました。この度、再び東日本で大変大きな地震が起きまして、まず思ったことは、阪神淡路大震災のような悲劇が再び繰り返されたことに対するやるせない気持ちでした。本当にもう私たちは、一つ一つの災害で経験したことをしっかり踏まえて将来の教訓にしていけないといけない。無念の思いで亡くなられた人びとの〈死〉を受け止めて、残された私たちは〈生〉の意味へと転化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生きることが必然的に伴う〈逆説的な力〉について、現代を生きる私たちは真摯に考え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います。今回のシンポジウムで私が特に関心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は、阪神淡路大震災と東日本大震災の間には、どのような違いがあっ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す。阪神淡路大震災は、ご存じのように都市直下型地震でした。したがって、被災や復興のあり方は東日本大震災と大きく異なっています。特に神戸には、高度経済成長期を経て、多くの高齢者が住んでいました。戦前や戦後間もなくに建てられた狭小な家屋が密集する地域、いわゆるインナーシティにおいて地震の被害はもっとも甚大だったのですが、そこでの被災者には、農村から都市に出て来た高齢者を多く含みました。したがって、復興まちづくりの後には、確かにまちはきれいになったのですが、もともと住んでいた高齢者たちが、まちは戻れなかった場合も少な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彼らの多くは借地借家でした。震災復興で地主や家主が新しい家を建てるわけですが、防災上安全な建物に変わっても、元々住んでいた人たちが同じところに続けて住めるかどうかは別の問題でした。阪神淡路大震災では、まちが復興していく姿とは裏腹に、例えば自ら命を絶つ方、あるいは高齢者が一人暮らしを強いられ仮設住宅を転々とする中で孤独死していく、そういったことが非常に多く発生しました。今回の東日本大震災では、むしろ、家族とか地域の絆というものを非常に強く感じます。社会の対応というのがかなり異な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東北地方は秋を迎え、本格的な冬の訪れも間近です。昼が短くなって寒くなっていくと、寂しい思いが募るとき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そのことを心配しているのですが、幸い、避難所や仮設住宅の建設運営などで、阪神淡路大震災の教訓は多少生かされている部分もあると聞いています。このように、私自身は東日本大震災に対して、生活者の視点から、震災復興の途上で新しい生活がどのように実現されていくのかに関心を持っています。

高建国：

各位教授们好，我的题目是“防灾的经验、教训的中日比较”。首先我想讲的是，上个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七届北京-东京论坛，有幸认识几位日本的市长，如仙台市长奥山惠美子、新潟县知事泉田裕彦、长冈市长森民夫新，进行相互交流，共同参加了一次“灾后重建与地方合作”分论坛。在会上我作了6分钟发言，第一句话就说“我觉得，中国的市长和日本的市长不一样”，我说日本的市长都是防灾市长，因为他们拿出来的PPT都是对日本的灾后的一些考虑，做的非常得专业。中国的市长是经济市长，当前发展经济是头等大事。日本因为

是一个成熟社会嘛，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今天我首先就汶川地震重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大概讲四点。

第一点是，中国的汶川地震是 2008 年 5 月 12 号，汶川地震后 27 天，2008 年 6 月 8 日国务院颁布第 526 号令，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一次重大灾难制定的恢复重建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为一次重大灾难制定的恢复重建条例，以前从来没有过。1976 年唐山地震死了这么多人，也没有专门制定一个条例。

第二点，“一方有难，百方支援”。灾区重建按照“条例”行事，采取帮扶的方式、对口支援政策，建设速度快。既体现人道博爱的儒家精神，又实现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目标。

第三点，对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商场、交通枢纽等人员密集的公共服务设施，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增强抗震设防能力。重建中的中、小学校房屋质量保证，列为重中之重。我想这点我们应该向日本的朋友学习。1923 年关东大地震以后日本已开始认识到学校的抗震问题，1995 年阪神地震后更是如此。在日本学校是最坚固的建筑，地震发生后，其他房屋都可以倒塌，唯独学校不能倒，日本文部科学省的一份文件中称因为“学校是承担着日本未来的孩子们托付生命的地方”。这种理念深入人心。汶川地震中灾区教室抗震性能低于地震烈度造成大量的倒塌，2009 年汶川地震一周年官方宣布，审核认定的死亡学生和已经核查但尚未宣告为死亡的失踪学生共有 5300 余名。汶川地震后，全国各地都在加固学校教室，抗震性能已有了很大提高。

第四点，在重建中不是简单地复制原来建筑，如广东省佛山市援建的汶川县水磨镇，结合当地的民族文化进行大胆地重新设计规划，将水磨镇重建成了一个很适宜旅游的乡镇。震前很多出外打工的人留在家中即可通过旅游挣钱，生活比震前富裕多了。

另外，我们也通过一些交流，想探讨一下东日本地震重建的目的是什么，它的重点是什么。我认为大概也有三点。

我们怎么来看一下日本的九级地震。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从预测预防、地震保险、救援、海啸、核辐射都可以派生出很多课题。所以可以构建一个东日本九级地震学，每个课题都可以做一个博士论文或者硕士论文来进行研究。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地震以后，全世界的人都发现日本人非常地镇静，他们根本不慌张。举个例子说，日本人都等着政府来救援。旁边有一些住宅废墟里的一些木头。日本有个教授说，为什么大家不去捡那个木头呢。我也问过顾林生教授。顾教授说这就是私财啊。在中国灾民们捡废墟中的木头取暖做饭的。这是两国的国情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不理解是在中国发生了抢盐事件，可能日本朋友也从媒体上知道了。那几天之内，超市里面的盐被一抢而空。就是一种恐慌。我们的媒体也在宣传，说这个盐，90%不是海盐，是盐矿盐。因为我们的海盐大部分是作为工业盐，大颗粒的盐。但是也劝不住。

这三点是，第一，日本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核辐射的扩散”和被污染环境的复原问题，在此基础上思考“安全能源与地区重建相结合的地区重建规划”，以“再生能源替代核能源”为基轴，带动新产业、新生活方式的兴起，以此创造就业、挖掘经济增长点并给人

类提供一个新的文明理念和发展模式。我觉得日本当前要紧急处理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核扩散，核辐射的扩散和被污染的环境的复原问题。这条意见也是上海财经学院现在还正在日本的一位老师给我发过来的。她说在这基础上考虑安全能源和重建相结合的地区重建。海啸毕竟看得见，核辐射你也看不见啊，你不知道它在哪儿，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这是根据日本当前的情况提出一条建议。

第二，灾后重建选址注意的事项。那么大家请看这张图，这张深颜色的是 1896 年，当时的三陆地震，8 级地震导致的一个仙台市的海啸的区域。那么这个外围是 3.11 地震，海啸深入到是 4-5 公里。这次仙台市长奥山惠美子来了，她说如果没有一个高速公路挡住它，海啸还要进去 1 公里。那么这些土地，有一些已经变成海了，日本本来国土就很小，这次地震已经丧失了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有一些农田经过海水泡了以后，就没办法去种植水稻。灾后日本重建时选址的注意事项（1）地质上：a，避开全新世有过活动迹象的地段，探讨避让断层的最佳安全距离；b，避开有发生大型山崩、滑坡隐患的地段；c，查明场址下方有无中型以上溶洞、矿山采空区及大型古代墓葬、古代地下军事工程等；（2）环境上：a，沿海地带估算海啸的冲击强度和爬高高度；b，按场址地段历史和未来最大台风登陆时风暴潮强度，求取使用年限内的最佳安全强度；c，避开有火山爆发的危险地段。这是上海市地震局一位老专家对于日本重建的一个建议。

第三，响应 5 月 22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日本的第四届中国-日本全国领导人会议上建议，切实推进东北亚地震、海啸和火山研究项目防灾减灾合作，探讨建立应急、救援合作机制。我们现在谈的是民间的，政府间的合作也很重要。现在日本的政府进行调整，所以这个项目我们还是积极地推进。那么日本将来会不会还有大地震。这个现在应该事先有所考虑吧。

3.11 地震就是在日本专家研究的一个区域之内，那么下面一个地震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是我们研究所的徐道一教授，他在日本工作过两年。可以看到这次 3.11 地震，下面一个地震，可能是 8 级地震，这不是一般的地震。下面一个地震在什么地方呢？应该也是很清楚。他是根据李四光的一个假说来推算了，在震前推算了，不是震后啊。李四光的一个假说推算出来的一个，震前曾经四次发表文章，认为在日本、台湾与菲律宾一带可能要发生大的灾害，大的地震。那么后来反思了巴基斯坦地震和汶川地震的间隔，汶川地震和东日本地震的间隔，非常地接近，这是后来反思的。那边是震前反思。在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所所长李均之教授在两年前就预测到了日本有 10-30 米的大海啸。这位教授的成果得到了日本科学院院士上田诚也的肯定，他认为李均之的方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我想告诉大家，北京工业大学次声波仪器记录到了这次 3.11 地震的异常。这是 3 月 9 号的信号，次声波的信号有四千毫伏。汶川地震前有三千毫伏。这个是韩国的低气压，你可以看到，这两天前的低气压就在日本的地震的区域。因为它是在海里面，很难办，用这样的图就可以了。那么我想呢，除了我们现在研究重建以外，我们还得考虑如何防灾。因为两届联合国秘书长都讲过这样的问题。前任秘书长安南说：灾前预防不仅比灾后救灾更人道，而且更经济。本届秘书长潘基文：先发制人的减灾措施正是其关键。灾害事件发生后的反应机制无论多么有效，都永远是不够的。日

本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寺田寅彦语：“天灾总是在人们将其淡忘时来临。”这句极富哲理的警句虽然并不具体涉及天灾的科学内涵，但无论是对广大的公众还是对负责公共安全的政府官员，时至今日都是一个十分有教益的警示。中国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学者荀子说过“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中国政府应对灾害历来执行的方针是“防救结合，以防为主”。我们在研究灾害的时候，要研究四道防线：预测、预防、应急和重建。现在的方针有所改变，主要是加强应急和重建，这个好像我们踢足球啊。我们中国人足球没踢好，2012年伦敦奥运会入场券都没拿到。我们没有注意前场，也没注意中场，只注意后场，所以踢不好。日本的足球踢得比中国好，主要是各个前、中、后场都掌握好了。所以，我想还是要把它换换，把预测和预防放在前面。这样整个机制就搞对了。最重要的是预测，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地震，是世界上第一个7级以上地震有临震预测的地震。日本理科年表里有个地球科学大事记。承认海城地震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震前有预报的地震，这是得到公认的。它是怎么做呢，它就是将地震这样巨大的风险，领导承担一部分，专家承担一部分，群众承担一部分，这样把风险大大的降低了。我到海城考察，发现海城只有一个地震台，但有110个群测群防点，连动物园也作为一个观测点，老虎也成了它的一个观测员。海城市有2000多平方公里，过去一个地震台要承担这么大的地区；现在一分摊，一个群测群防点承担20平方公里，有什么地震前兆不能收集到呢？

在发言结束时，我想提醒日本朋友，就是地震前后也要注意台风。因为我为3.11东日本地震找到与之相关的8个热带风暴。任何事情都是有关连的。像大地震，大海啸，大洪水，大干旱，都不是独立的，都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叫灾害链。就是一个重大灾害发生以后激发另外一个重大灾害，并呈现链式有序结构的大灾才能形成这个灾害链。

宋金文：

刚才发言的是我们国家地震局防灾减震中心的专家，他先讲了汶川大地震的经验和教训，还讲了一个气候与地震的关联问题，以及今后地震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些现象。非常感谢。

下面请陈立行先生发言。

陈立行：

高老师从防灾技术的角度介绍了目前中国的现状，我的题目是“现代化社会抵御灾难的社会系统”我想谈一谈人类和灾难，以及如何通过社会系统来抵御现代化社会可能发生的灾害以及带来的伤害。

从人类社会的产生开始，如何面对自然灾害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课题。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人类还不能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人类能够做到的只能是通过社会系统的有效运作进行防灾和减灾。以最大的可能预报灾难的发生，减少灾难给人类带来的危害。防灾和减灾的意识来自对现代化社会的科学认识。在100多年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类来便捷和舒适的同时也潜藏着威胁人类生命的风险，而且很多风险和危害是目前科学技术难以解决的难题。工业化中潜藏着环境污染带给生命

的威胁；农业现代化中潜藏着作物对身体的危害：瘦肉精，蛋白粉都是科技现代化的成果；核电站在地震和海啸的自然灾害中变成了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原子弹。这些无时不在的风险与危害潜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旦自然灾害来临，这些潜藏的危害就会演变成巨大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现代社会所潜藏的危害，一旦降临不管你是亿万富翁，还是一个乞丐，大家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的意识形成了大家尊重生命的共同认识，而且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生命的尊重已逐渐成为一种超越国界，超越文化的普世价值观。

第二点，在现代化社会个人自给自足的空间越来越小，每个人离开他人几乎无法生活。每一个人都是这部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虽然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任何人都不能靠个人或某个圈子的力量完全控制这种风险和灾难。因此社会科学一直都在寻求通过社会系统整体的有效运行来减轻现代化社会各种灾难带给个人的威胁。也就是说只能靠社会整体的力量才能够抵御这样的风险。这个社会不只是指某个特定的社会，也包括全球社会。可能是由于这样的担忧，20年代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曾经风靡一时，其影响至今不衰。帕森斯提出社会系统的结构由目的，手段，条件，规范四个部分构成。任何社会中，大到社会运动，小到一件小小的项目的实施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来操作。政治为社会系统指明目的，经济为社会系统提供实现目的的条件，各种组织和个人为社会系统提供实现目的的手段，法律和道德提供实现目的的规范。这四个组成部分相互发挥作用社会系统才能产生有效的机制。

下面谈一谈3.11地震后日本社会系统运作的情况。首先，日本是一个地震，海啸，台风的多发国家。第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的发生和发展都比中国早一些。第三，日本在文化方面与中国有很多相近之处。因此，日本在防灾和减灾方面的社会系统运作的经验会对中国有些借鉴作用。我很赞成高老师讲的，对于可能发生的灾难，应该把重点放在防止，而不只是事后重建。

其实现代化社会中防灾和减灾的机制是渗透在每个人，每个部门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当然防灾的目标和防灾所需的物质储备是必不可少的，但灾害一旦降临，这一系统能否有效地发挥机制主要决定于每一个岗位上的人，具体的就是各种从业人员的坚守职责的行为。3.11的地震发生在下午3点左右。地震发生后、无论是国会，电台等重要部门，还是普通的学校，幼儿园，商店也很少有人离开职守，不管你做什么工作，都没有人先往家里跑，全部各就各位。在东京，到了5点钟以后大家才开始陆续下班，但是地铁已经停了。6点钟左右各地铁车站汇集了成千上万的人，7点钟地铁站通知滞留旅客，东京市内的公共设施对外开放，回不了家的人，可以到各公共设施过夜。3月份还很冷，8点钟左右，毯子，方便面等防灾物资全部运送到各公共设施和地铁站。这些大量的工作是由谁来做的，这不仅是各级政府，各种企业和学校也都有防灾程序，程序中设计了一旦灾难发生，自己的部门和单位如何应对，如何和其他部门和单位协作。每项具体的工作都有具体的人员负责。一旦遇到大的灾害，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这些都是工作和职务的一部分。

现在中国还没有如此防灾程序，在四川大地震后，不顾自己家人坚守职责的人受到表扬，成为一种赞赏。在日本，在灾难发生后，你是警察，你不能先救你家人，你要先救民众；你

是老师，你不能回家，你要先保护学生；你是医生，你不能先回家，你要先保护患者。3.11那天，家住千叶的外甥和正好和老师去东京参加体育活动，由于交通电话中断，根本联系不上。可家长并不过分担心，因为家长相信老师决不会离开学生自己回家的。各种从业人员的坚守职责的行为使日本设计的防灾系统有效的发挥了作用。

大家一定非常关心，防灾系统如何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确实，系统的设计并不困难，但是如何让这些系统有效地运作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们可以比喻现代化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系统中的一个零部件。换句话说每一个职位的设计都有与其相符的具体职能。职能的发挥有四种可能，第一是尽职尽责，第二是不到位，第三是越位，第四是错位。第二种不到位的话，会使系统的整体效果下降，但不会对其他职位产生负面作用，可怕的是越位和错位的现象，这种现象会对其他职位产生负面影响，影响其他人的工作，在各种零部件之间形成一种反作用力，最后使社会系统整体的机制产生故障。越位和错位的现象具体表现就是职业工作中个人的肆意行为。所以在社会系统中承担监督作用的法律的作用就要束缚个人的肆意行为。如果法律的职位产生不到位或越位，错位的现象，其他职位的恣意行为就会越演越烈。中国常说的管理体制，行政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不到位就属于这种现象。这一部分产生的反作用力会让其它职位的肆意行为不断泛滥，结果就是社会系统整体失去效力。

3.11以后日本基本没有囤积和涨价的现象。不仅没有抢盐，在货架上出现断货的情况下也很少有商店趁机涨价。为什么呢，不仅是因为有法律的监督，更重要的是有公众的舆论监督。在日本，如果某个商店在这个灾难时期涨价的话，可能会赚到一笔钱，但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消费者会认为那家商店没有道德，一个缺乏道德的商店是绝不可能讲信用的。那么，一旦恢复正常，以后再搞任何促销，民众都会对他的商品质量产生怀疑。只要有其他商店，就再也不到哪家商店买东西。所以日本的商家非常害怕这一点，在交通和生产困难的时候可以断货，但不能涨价，这就是一种民众的道德评价的监督机制。如果出现很多商店都涨价的话，那么政府和法律就会出来干涉和处理，严厉惩罚不法商家，保证市场的安定。

在现代化社会中，因为个人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和抵御灾难，只有通过社会系统的有效运作才有可能抵御和降低各种灾难可能带来的危害。因此诚实和信赖，也就是诚信非常重要。在现代化社会的诚信和以往具有不同的意义，不是针对某个人和某件事的诚实和信赖，而是针对自己的职业和责任的诚信。诚实产生了信赖，信赖产生安心。多层次的相互信赖就减少了系统中各种职位不到位，越位，错位的现象。这样面对灾难，防灾系统就发挥了作用。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系统有效运作的方法，对于手段和规范在各个层次的彻底管理非常重要，严格惩罚各种渎职行为，提高全体民众的职业道德，形成诚信的机制。如果没有诚信的机制，灾难来临时大家都会只顾自己，那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恐慌，混乱的状态，防灾的系统制定的再好也不能发生作用，救灾需要上级领导，甚至需要总理亲临指挥，但更需要的是民众有秩序的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灾难时的尽职尽责的工作必须建立在全社会多层次的诚信关系。有了这种诚信关系，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坚守职责。

要做到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不越位，不错位地坚守职守，并只是职业道德范畴的问题，而是保证现代化社会系统有效运行的根本问题。这不仅针对防灾系统的运作，在日常的

社会生活中也是同样重要。诚信是相互行为，必须有大多数人的共同努力。这种诚信的建立需要三个层次的努力，第一是对现代化社会职业的认识转变，所有的职业不仅只是一种获取金钱的生存手段，而是被赋予了对其服务对象行使的权力和责任。医生被赋予了给患者治疗的权力和责任，教师被赋予了引导儿童知识和价值观形成的权力和责任，食品生产商家被赋予了消费者健康管理的权力和责任，下水道工人也被赋予了让居民能够安居生活的权力和责任。即便是国家总统也是一样，只是这一职位附带了更大的国家权力和责任而已。只行使权力不履行责任是一种渎职行为。第二是对市场机制和公共事务，公共道德，公共责任的差异的认识。金钱万能，市场万能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即便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都是：“没钱是不能的，但金钱不是万能的”。其原因就是现代化社会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同呼吸共命运的系统，个人作为系统中的一分子，其肆意行为必然给其他分子造成危害，造成系统正常运作的失调。只有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以公民的公共道德履行公共责任才能抵御和减轻各种灾害可能带给个人的灾难。第三是强化法律和道德的规范作用。在现代化社会要保证社会系统的正常运作和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严格限制所有职业中越位和错位的肆意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会破坏社会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加大现代化成果中潜藏的风险和威胁。具体表现就是惩罚渎职行为，对于企图用权利和金钱破坏法律秩序，破坏社会道德的行为更要严惩。

比方在中国不能根除的瘦肉精，最早是在 90 年代在美国研究成功的，但是美国研究成功后在投入使用的之前发现了给动物试用的时候发生了痉挛现象。如果这样的科研成果用于生产过程的话，一旦出现人的痉挛现象，很多厂家就会因为赔偿垮掉。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在瘦肉精的文献中不可能没发现给动物试用的时候发生了痉挛现象的记载，那么为什么还要使用呢，就是金钱万能的诱惑效应奏效，法律和道德的规范作用失效的原因。中国人的创新欲望很强，几乎不亚于美国。大家都在想创新，可是在创新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它的另一面，就是它所潜在风险。中国目前不是缺乏创新能力，而是严重缺乏抵御新技术，新产品中潜藏的危害的认识和能力。如果对创新的风险有足够的认识和防御的措施，平时就要一次又一次反复不断地交学费，到了灾难的时候后果就会更加严重。因此我们用社会系统运作的体制和机制来进行中日社会比较的话就可能找出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谢谢。

王志秋：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大学的时候日语是二外，但是现在基本都还给老师了。现在在工作中跟日本的合作还是很多。因为我从事的工作就是国际救援，地震灾害紧急救援，我是从救援的角度来讲一讲。

3.11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带着中国国际救援队和日本的国际救援队，在新西兰的基督城救援。因为新西兰基督城也发生了一个 6.8 级的地震，当时在那个大楼的废墟里面有 28 个日本的学生，和 24 个中国的学生，都被埋在那个大楼里面，最后都遇难了。所以说中国国际救援队和日本国际救援队同时在那个大楼开展工作，正在基督城救援的过程中，

日本发生大地震了，所以日本救援队赶紧就回去了，我们也从基督城撤出来，回到了中国，就准备去日本参加救援行动。从新西兰回来以后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直接转机去了日本。

长时间以来中日两国在地震救援这方面的合作还是非常紧密的。也确实是因为中日之间，对西方人来说，从面孔上他们本来就分不出来谁是日本人，谁是中国人，他们认为大家都是亚洲人。这个语言方面，虽然日语忘了很多，但是看了这么久，这么多汉字，还是大概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的文化等方面还是源远流长，有很多密切的联系。但是合作这么多年来，说实在的，有愉快也有不愉快，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当然中国国际救援队通过国际救援的工作可能政府行为更明显一些，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政府的行为更加突出，所以使得这些队伍之间的合作上有一些磕磕碰碰。但总体来说，是非常好的。

合作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我更关注的是灾害发生以后 0 到 72 个小时的救援，因为我们是搞救援的，更关心的是 0 到 72 小时，因为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日本这次大地震发生以后 0 到 72 小时内的救援工作还是不错的，日本有日本的特色；中国汶川地震发生以后，0 到 72 小时内也做了很多工作。两边的工作还是孑然不动的，中国还是采取人海战术，能去的基本上都去，基本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但是人们热情比较高。日本呢，还是像你们说的，机制在，是按部就班，各司其职，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可能救援效果也更好一些，中国的救援效果也还行，但是从专业角度来说还是差了很多的。

那么这次救援的 0 到 72 小时，刚才也提到中日韩联动机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是东亚国家，在亚洲，联合国国际救援组织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应该发挥更主要的作用，所以说中日韩的这种共同抗灾的机制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面对自然灾害，我们可以抛弃一些意识形态等其他一些想法，来共同做好这件事情。

这几年跟日本的合作主要是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救援队伍合作，因为在国际救援领域，中国和日本国际救援队，经常会走在一起，参加国际上的救援队长会，同时接受联合国的国际重型救援队的测评，因为日本国际救援队已经通过了联合国的国际重型救援队的等级测评，成为联合国认证的国际重型救援队，中国在 2009 年也通过了联合国国际重型救援队的测评，所以说中国国际救援队和日本国际救援队都是拿到了联合国认证的，那么这就可以在全世界开展国际救援的工作，到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这个国家允许。比如说新西兰啊，巴基斯坦啊，伊朗啊，伊拉克啊这些国家，只要他们邀请我们都可以参加。日本也一样，我们可以去日本参加救援，日本也可以到中国来。所以说在没有发生灾害的时候，中日两国之间在国际救援队伍建设这方面交流非常紧密。我们互相之间还是有一些竞争的感觉或者说是氛围，因为中国也希望在国际救援领域至少要拿到资格认证。日本也说中国也通过了联合国这个资格认证，所谓国际重型救援队，我们日本也一定要通过这样一个认证。所以有一些比和争，这些是很好的，在竞争中得到生存，在竞争中发展。

第二个就是日本在救援方面比我们的技术成型，虽然中国国际救援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从技术、思路和理念上面跟日本还是有很大差距。所以说通过 JECA 项目，我们跟日本的 JECA 项目合作非常紧密，日本通过 JECA 项目给我们培养了很多教官，这个项目现在还在执行过程中，三年期间。所以说跟日本在 JECA 项目上合作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在共同行动上，比如说这次新西兰基督城的共同合作，虽然刚开始做得不是很好，但是后面做得很好。这就是竞争在里面起的作用。因为到了基督城的时候，同样是一片大楼的废墟里面，大火烧过之后的废墟里面，大概埋了有 100 多人，生存的希望都很渺茫，这里面就包括日本的 28 人，和中国的 24 个孩子。日本救援队是先去的一支队伍，日本救援队就跟澳大利亚救援队开始在这片废墟上作业，中国国际救援队去得稍微晚一点，因为我们的孩子也埋在这个大楼下面，所以中国国际救援队肯定要在在这个大楼的废墟上开展救援，要把我们的孩子找到。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场地上工作，必须要征求已经在这上面开展工作的两支队伍，就是日本救援队和澳大利亚救援队，所以说我们在国际救援组织的协调下，我们就希望跟日本进行合作，当时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跟日本合作，因为毕竟有 JECA 项目，要共同在这找我们的孩子。但是也可能是因为竞争关系，当时的日本救援队队长，他可能是外务省的，他就说，我们这个场地，我们的能力已经够了，救援人员已经够多的了，不希望其他国家的救援队再加入进来，同时还说语言不通，容易形成障碍，造成危险，种种原因吧，不接纳中国国际救援队在这个场地工作。但是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我们中国国际救援队去了，我们的孩子就埋在这个底下，我们肯定要在在这工作，所以说日本救援队当时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们跟澳大利亚救援队要求，西方的国际救援队他们就很奇怪，说中国和日本，应该是关系还不错，救援队在同一片废墟里工作没有什么问题，都是大家一块救援，最多就是把这一片废墟分成这边一片，那边一片，大家分，分多分少，分得清楚一点都可以的，但是他们就没想到日本救援队就是不同意。但是澳大利亚救援队说，我们没问题，我们同意，澳大利亚救援队觉得中国的孩子埋在这下面，中国救援队在这里开展工作很正常。所以我们就跟澳大利亚救援队在一起工作，最后把整个工作都完成了。但是在救援过程中，跟日本救援队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我们一合作起来就非常好，所以说这里面是队长跟队长之间的问题，队员没问题，队伍也都没问题，一工作起来就好了。

当时我就找到日本救援队队长，跟他聊了聊，因为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一块工作，从各种角度来说都应该是合作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当然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也在那，他们还是希望由他们自己救好一点，因为毕竟日本孩子和中国孩子混在一起，没有分开，都是亚洲人，而且那时候看不出来是中国孩子还是日本孩子，都是同样的面孔，分不出来，你只能最后 DNA，或者翻他身份证什么的，才能区别出来，所以从这种角度容易混淆，分不清楚。但是因为日本派了三个救援队来，第一个救援队队长不接受，第二个救援队队长就接受了，后来合作起来就很好。所以说这个我估计就是当时两个队伍存在竞争，引起的一些不必要的障碍。

3.11 海啸和大地震发生以后，因为我们毕竟是一衣带水，日本发生这么大灾难，我们肯定要派救援队去。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国际救援队这个政府间的色彩更浓重些，包括韩国也要派救援队去日本，地震这么大，伤亡也很大，作为邻国，我们应该去帮助救援。但是日本外务省迟迟没有发出邀请，他们只是问说，你们能派出多少队伍，我们说你们要多少人我们就能派出多少人，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有 400 多人，是通过联合国认证的绝对专业的队伍。他说 400 人肯定不行，我说 80 人也行，60 人也行，最后他就减为 15 人，人数在减，同时日本

外务省说我们需要你们的搜救犬来一只。其实这些就是政治上，我觉得就是官方给加了一些条件，造成了障碍。

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国家做了一件比较好的事，第一次打开国门，接受国际救援队伍到我们国家的灾害现场执行救援任务，第一支队伍就是日本救援队，我们邀请日本救援队 60 多人到中国来，同时还邀请了韩国、俄罗斯和新加坡的救援队伍到中国来，在灾害现场开展救援。这对中国来说是迈出了第一步，打开国门，接受国际救援队伍。

那么日本这次大地震呢，后来我就说，汶川地震我们邀请你们来了，那么你们发生这个东日本大地震，作为礼尚往来，我们也应该去参加救援，所以说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只邀请了中国的救援队 15 人到日本去参加救援。所以说民间的各种活动一定要大力开展，如果有政府色彩，就会出现很多有芥蒂的事情。这个我确实觉得很难避免。因为日本政局也很动荡，这么多年来换首相是换的最频的，像日本是全世界换首相换得最频的。但是中国和日本，文化上毕竟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在救援上我们觉得还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走得更近一些，更好一些，这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在 0 到 72 小时救援方面，建立一个协调机制。因为我们两个国家太近了，很容易互相救援，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事业应该没有任何政治色彩，这完全是好朋友的帮助，所以说可以做很多工作；

第二个就是中日韩应协调联动机制，这个刚才也说了，温总理确实提出了这个建议，三方也已经签了协议，就是说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以后，无论是中国、日本和韩国，三方都是有联动机制的。其他国际社会怎么样不管，但是这三方一定要协同机制，协同开展工作；

第三个就是中国和日本同样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接受国际救援援助机制。这方面中国做的不太好，日本也不太开放，中国在汶川 8 级地震发生，造成这么多人员伤亡，联合国认为这是国际灾难了，这不是你中国自己的灾难，既然是一次国际灾难，这就一定是一次国际救援的大的实践活动，这至少应该是一次国际救援的实践活动。但是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其他国家的救援队就都没有邀请过来，只邀请了日本、韩国、俄罗斯和新加坡这 4 支国际救援队伍到中国来参加救援。像新西兰，我们到新西兰参加救援工作时，新西兰政府是所有的救援行动全部都交给国际救援队来做，新西兰政府他就是把整个灾区戒严以后，所有的国际上的这种专业的救援队伍你们来，把救援工作全部交给国际救援队来做。所以说各个国家的国际救援队在那种灾难现场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是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队伍，所以说中国和日本在这方面做的都不太好，确实都不好。我们可能是有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其实中国主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机制，没有见过这种事情，闻所未闻。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国门关上了，现在国门打开了，那么汶川地震时我们也在自己救自己，但是没有想到如何利用国际上的这些救援资源。这些救援资源非常丰富，而且非常专业，非常好，那么如何利用他们，中日两国这方面都要做一些努力。

今天来这里还是很高兴，主要还是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和学习的态度来的，所以说没有准备 PPT，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好好做一做。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首藤明和：では、西原先生、話題提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西原和久：

我是名古屋大学的老师，名古屋大学の環境学研究科・社会学講座の西原和久と申します。本日は5分間お話をするようにとのことでメモを作ってきましたが、PPTを使っていらっしゃる方もおられるので、いま作りました。それに基づいてお話しします。私が話したかったのは、災害「研究」の今後のあり方ということで、ちょうど高先生の話や王先生の話に非常に関連する話題になりそうだと思います。その中で、今回は「災害と外国人」というテーマに絞って、簡単に話します。

私自身は社会学理論の専門で、現在日本社会学理論学会の会長をしています。そして、現在の研究テーマは、グローバル化とアジアについて考えています。その際の視点として、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な視角をどうやって社会学研究に導入していくかという問題意識があります。そこで、その視角についてちょっと話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というのも、今までの社会研究は、社会学を含めてですが、メソドロジカルに、方法論的に非常にナショナルなレベルに閉じられた研究が多かった。私は、そういうものを批判して、国と国の国境を越える方法論的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リズムを目指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て、特に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な交流、つまり脱国家的な社会文化的イクスチェンジ（交流）というものに注目してい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過去3年、日本の小さな農村、長野県の人口四千人余りの村に、今年は805人のアジアの労働者が、季節労働者、ゲストワーカーとして働きに来ています。正確には「技能実習生」ですが、実態は労働者です。その805人のうち、630人は中国人です。そこで、中国人ゲストワーカーの研究をしてきました。しかし、大震災がありましたので、東北学院大学、東北大学などと一緒に、いま「震災と外国人」というプロジェクト・チームをつくって研究し始めました。

皆さんは、「佐藤水産」という名前をご存じだと思います。この話は中国でも放送で流れました。20名の中国人実習生、つまり労働者を日本人専務が高台に救出したという話です。実はこれが写真ですが、工場はもう潰れています。この裏に高台があって神社があるのですが、ここに20人を避難させて助けました。その専務が、その後工場に戻って、この工場の中で津波で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話です。この町、宮城県女川町の海岸沿いはひどい状態で、あちこちでビルが倒壊し破壊されている。少し離れた石巻の雄勝（町）というところは、バスが二階建ての市民センターの上に載っている。それからこれは南三陸町で、ほぼ町全体が壊滅的な打撃を受けた。この真ん中に、ここに防災センターがあるのですが、骨組みだけが残った防災対策庁舎の3階で、女性アナウンサーが最後まで逃げてください、逃げてくださいという放送をしていて、そこにも津波が来て、この女性が亡くなられてしまった。こういう状況になってしまい、象徴的に津波のものすごさの記憶が

残さ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す。他に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が、5分という枠ですので、これだけに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先ほど触れた、あの長野県の外国人労働者に戻ります。今年805人のうち、630人が中国人だと述べましたが、その他には、フィリピン人が137人働いています。中国人はレッドキャップを被って、フィリピン人はグリーンキャップをかぶっています。さらに、吉林省の送り出し機関でお話を伺った写真には、「境外就業先進単位」とか、外派の労働基地とあります。聞き取り調査をおこなって、ゲストワーカーや関係者の生の声も聞いてきたりしていますが、今日は省略します。

さて、今後の課題についてですが、こういう立場から社会理論的な今後の焦点としていくつか挙げたいのですが、まずは国家の入国管理政策の問題があります。これは先ほどの王先生の話と非常に重なっていて、日本政府には、外国の支援の方々の入国を拒むという、信じられないような対応がみられました。これは今後の入国管理政策全体にも関わることだろうと思います。実はほとんど報じられていないけれども、震災で多くの外国人の死者を出しています（その後の警察庁発表で、中国人8名を含む死者32人というデータが公表されました）。2万人近い死者・行方不明者という状況の中で、実際に外国籍の犠牲者は大きな数ではないように思わ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たとえば国際結婚して日本に帰化している人たちもいますから、そういう数を入れると、決して少なくない数だと言え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ただし、元々東北は外国人が少ない地域でしたから、東京や愛知という非常に外国人率が高い地域で災害が起こればと考えると、ぞっとしますね。いずれにせよ、災害時に、外国人の生命・身体をどう守るかという重要な問題は、あまりメディアでは論じられておりません。もう一つ、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な面を考えていくときに、国際支援の現状が重要だと、高先生のさきほどの非常によく整理されたいろいろな論点の図の中にもありましたが、その中に支援の問題とともに、外国人労働者、国際結婚者、留学生なども着目できます。そして、王先生のお話の中では救援隊の話もありましたので、まさにこの話なんです。政府レベルあるいは政府から派遣されて様々な機関の救援、それからNGO、さらにNGOの形にはオーガナイズされていないボランティアの人びと、こういう人たちの救援の様子もしっかり捉える必要がある。もちろん、さらに研究者が支援にどう関われるかという問題もありますが、ここでは簡単に30秒ずつ3つ事例を紹介しようと思います。

何回か私も現地に入って、いろいろな支援活動を見聞きするようにはしていましたが、一つは、フィリピンのケースで、フィリピンはまあキリスト教の教会関係でつながっていることもあるのですが、たくさんフィリピン人が災害に遭い、それに対して全国的なフィリピン人の支援のネットワークで、生活物資を運んだりしています。でも、それにはちょっと問題もあって、なぜフィリピンだけ助けるのかという意味で、それはゲットー化された、ナショナリスティックな動きではないかと言う人もいるわけですね。もちろん当事者たちは、可能な限り支援の輪を広げたいと考えているようですが。また第二の事例として、

台湾の事例があります。実は先々週ですが、東北調査に行ったときに泊まっていたホテルにはたくさんのボランティアの人やそれから建設関係の人たちも宿泊しており、そうした人たちに混じって、百人ぐらいの台湾の人たち（仏教系だと伺いました）がグループできてきました。何をしに来ているかと尋ねると、台湾で集めた救援金、支援金を災害にあった人びとの個々の家を訪問して、5万円前後のお金を直接手渡し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をやっているのです。お金を集めて、赤十字に送ってもどこに行くかわからない。災害に遭った人の当座の生活のために、手渡しでお金を直接被災者に渡すために百人単位のグループで来て、支援の実践をしていました。最後の30秒です。ちょっと喋りすぎですが、今回この北京で私の教え子で、いま日本の新聞社の北京支局員の奥さんたちになっている人びとと会ったのです。そして、その奥さんのグループが、こっち（北京）にいるから日本には何もできないけれども、インターネットを使ってサイトを立ち上げ、福島原発の周辺の地域の人びとで、他地域に移動したい人を募り、そしてそれ以外の地域で彼らを受け入れてもいいという人たちを結びつける活動をしている。「移動したい人、移動したい人を受け入れる人、募集」っていう形で、両方を募集して、それを繋ぎ合わせるっていう活動をここ北京にいて、ネット上でやっているのです。すでに何組も成功例を出しているという、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も（災害の現地にいかなくても）できるのだなということを感じました。

日本社会学会は2006年に韓国との学術協定を結んで、学術交流を始めています。それから今年、日中の間でも日本社会学会と中国社会学会の協定を結んで、来年から相互に招聘し合うということを決めました。私が会長をしている理論学会も今年、日韓の学術協定を結び、来年から交流を本格化します。中国ともそうした協定を結び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が、もう一つ私は日中社会学会の理事もしているので、これと私どもの社会学理論学会と合わせて、中国、韓国と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に交流したいという夢も持っています。これはちょうど王先生のお話とも関わってきます。僕自身は災害の研究者ではないのですが、研究者として何ができるか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ていたときに、そういう災害をめぐる、研究者の国際交流や人的なネットワークを強化して、やれることをやっていくという、そういう点での期待と希望を持って、今日ここに来ました。長くなりましたが、私の話は以上です。谢谢。

宋金文: 下面请伍国春老师发言

伍国春:

我在名大读博士时开始灾害研究，回国后进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所有一个社会学研究室，在这里做灾害社会学研究。我去名大读书的时间非常巧，如果再早一点的话，我想我可能不会做灾害研究，正好是04年，因为03年中国发生了SARS，给我的触动非常深。当我的导师建议我做灾害研究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因为SARS发生时，我的感觉就是同样的问题如果发生在美国或日本，不会酿成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酿成这么大的事情？肯定是我们的社会系统有问题。这是我开始做灾害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在

名大的时候做了一些调查，包括在日本的调查，比如中越冲地震、神户地震啊；还有后来发生了印尼海啸，我也去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做了两次社会调查。下面我想结合自己的工作，还有自己迄今为止的研究先谈一点。

首先，社会学的灾害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灾害研究对象不同。我在一个理科的研究所里，有时和理科的一些科学家们一起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昆仑山发生地震他们也要去考察，但是对于我们做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昆仑山那种地方发生地震，它是9级的也好10级的也好，我们肯定是不去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失。我们灾害社会学要做的就是如果这个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失了，才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这就是我们说的 disaster 和 hazard 的区别。

其次，灾害社会学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就是说灾害是一个紧急事件，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尤其像地震这样的灾害，几秒钟以后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能解决。我们说灾害实际上是把一种本来镶嵌在社会系统中的问题，通过灾害这种自然现象，一下子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研究的是紧急社会系统中表现出来的问题，但实际上这种问题应该追溯到灾前来考虑。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说日本地震这次出现的核问题，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出现。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就是说日本近现代以后地震灾害的社会趋势的变迁，随着日本进入现代化以后，地震的后果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多样性，连锁性。核问题其实2007年中越冲地震的时候，已经发生过。那是一次六点几级的地震，新泻有一个丰田汽车零部件加工厂，它实际上是生产螺丝的，但是由于它的产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百分之九十多。所以导致整个丰田甚至其他日本汽车厂商都停产。另外，新泻地区的核电站发生了处理水的泄露，最后世界原子能机构都跑到那里去调查。那个核电站关闭了好长时间。其实这是一个小的地震，但是由于日本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已经导致了日本对能源的严重依赖。所以最后，它这次地震发生核问题，简单的讲是一个核问题和防灾问题；但是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现代化的问题。就要归结到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这方面来考虑，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第三，我们通过灾害看到的是一种表象，实际上是它平时的社会是如何运转的结果。我去年夏天在汶川绵阳地区做了问卷调查，大概有效问卷回收了970多份。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首先就是我们中央政府要求三年恢复重建，两年完成。我给恢复重建定义为“面子恢复重建”。什么叫“面子恢复重建”？我们沿着主路驱车前行的时候，你会看到道路两边那些建筑物，农居都建的非常的好，到了羌族地区了，到了绵竹啦，然后每个地方很有地方特色的这个民居就出来了。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恢复重建效果很好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一旦离开主要道路，进入小路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房子，还没有重建，我在做调查的时候，好多老百姓只能在自己毁坏的房屋旁边搭一个帐篷，然后在那边住。自己的房子什么时候建成，他们不知道。实际上我的调查数据显示有将近66%的人认为（恢复重建，就是在地震灾害两年的时候），恢复重建扩大了不平等。如果我们再回到“灾害呈现了嵌入社会的一些问题”的主题上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最大的问题，一个是城乡差距，另外一个就是说一

些在城市里面的低收入群体。如果再发生灾害，他们依然是受灾群体，他们依然是不能够很快从灾害中恢复出来的群体。

最后，回到我现在的工作，一方面上述的研究，另一方面，主要是做预防研究。现在有的日本灾害社会学家，提出来「事前復興」的概念，就是说事先的恢复重建。根据阪神地震的研究，他们认为灾害发生以后再进行恢复重建会产生很多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事先来考虑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从防灾方面提前来做一下恢复重建的问题呢？对于我们来说，从汶川地震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当务之急要做的就是农村危旧房改造问题。为什么？汶川地震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城市，比如说在成都，采用现代技术建筑的一些房屋是没有问题的，受灾的都是一些农居，老旧的房子。一方面，从自己的能力来说，他可能没有能力建好，另外一方面，从他的个人的意识来说，他可能也觉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建。农居安全工程，如果单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和农民的科学意识不够的问题。从大的中国社会结构考虑，实际上是城市和农村差距问题。我们考虑农居安全问题，会考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部经济发展中的地区，还有西部落后地区。因为我回国以后在甘肃山区，还有云南山区，一直都在深山里做问卷调查。两次问卷也做了大概有 2000 多份了，然后加在一起，就是我们地震局做一个叫“南北地震带”的科学研究，需要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的支持。我们希望通过调研，来促进中央政府，比如东部发达地区它建一栋 10 来万 20 万的房子，对农民来说不是问题。但是对西部地区来说，建一栋 5、6 万 7、8 万的房子，你进行抗震结构改造以后呢，会增加他的负担。那中央是不是应该根据不同的地区来提供不同的政策的支援，解决地区差异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把事情提前做好，等到下个 5、6 级地震，6 级地震的时候，不至于让我们死掉那么多人，塌掉那么多的房子，增加我们抵御地震灾害的能力，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事情。另外一方面，回到日本的大地震，对于我们防震减灾的人来说，就是因为我经常和理科的人在一起，他们会提到日本的海啸大地震，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的房子建的结实，如果没有海啸的话，日本的单纯的地震损失会很小，为什么，因为它是板块地震，它实际上和中国的「直下型地震」是完全不一样的，差距很大。它这个震源和地震的距离太远，造成的损失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都看到了，房子建的结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日本的地震通过中国媒体的报道，在我的问卷调查中也反映出来，就是说汶川地震加上日本的地震，现在即便是在深山里的老百姓都认识到，把房子建结实，比什么都重要。我想这是目前中国农民的科技意识比较让我们欣慰的一点。就讲这些。

首藤明和：それでは、坪谷先生、話題提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坪谷欧美子：

大家好，我是坪谷。我的工作单位是横滨市立大学。非常感谢给我发表的机会。我的专业是全球化问题，特别是国际社会学和国际移民的问题。我主要从事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国际劳动力的研究。今天发表的主题就是：关于在日本的中国人他们的网络和日本地区社会

或者社区他们之间的合作或者协力问题。我想通过东日本大地震的今年，如何重建实现多元化社会中来说多元社会。じゃ、ええと、以下は日本語で報告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私の専門は国際社会学ですが、人の移動の研究を続けていまして、その中でも特に在日中国人のネットワークやコミュニティの問題を研究してまいりました。在日中国人が現在の日本では最大の外国人集団であり、最新の統計ではおよそ70万人となっております。在日中国人を在留資格別に集計したのがこの図です。今回の東日本大震災で被災した外国人の関係に関しては、先ほどの西原先生のご報告に詳しく思います。私の本日の報告は先生のご報告と内容的に重なりがありますので、どう考えても私が研究するものより西原先生が研究なさったほうが素晴らしい結果が出ることは明らかなので、ちょっと困ったなあ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すが、ここでは何とか私なりが視点を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えます。

私が住んでいる首都圏では、直接被災をしたという人は少ないのですが、外国人の住民および彼らを多く抱える自治体、横浜市、川崎市、東京都などでは、都市が防災など危機的状況に瀕した時に、どのように外国人のネットワークやコミュニティと連携するのが大きな問題となっております。日ごろから防災への備えが重要だとはよく言われてはいましたが、今回の震災を経てとくに多言語で震災や原発に関する情報の発信が大きな課題になっています。特に危機的な状況であるからこそやはり自分の母語で、自分が一番慣れ親しんだ言葉で正しい情報を得たいということは当然のことと思います。また、「やさしい日本語」というものが震災時などの緊急時にのみ特別に使用するために作られていますが、これは非常に簡略化された日本語で、たとえば「今、大きい地震、起きてます」などと、日本語の文法からすると正しくはないので、これを普段に使ってはいけないと、日本語教育の研究者などは提唱しています。とにかく日本語を解さない人も何らかの方法で正しい情報を得られるような体制、地震だけでなく津波や原発に関しても十分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ということが、首都圏の各自治体や地域社会でも大きな問題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こうしたことを通して、議論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ているのが、単なる「防災」という問題にとどまらず、日頃から「まちづくり」を視野に入れて検討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議論が非常に大きくなってきます。このような問題に対して特にエスニック・ネットワークという外国人住民や外国人市民の観点から考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今回のプロジェクトの研究テーマとして選びました。自治体とか地域社会と彼ら独自のネットワークやコミュニティといかに連携するかという問題です。中国人ネットワークやコミュニティは今回の震災にあたりどのような反応を示したのか、どのような機能を果たしたのかという問題を、首都圏を中心に少し調べ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たとえば阪神大震災の後、各外国人コミュニティが活動を活発に行い、例えば中国人の例では、南京町が新たに活性化したというような例も聞いております。また、横浜や川崎は特に戦前から日本にいる在日華僑や在日韓国・朝鮮人たちのコミュニティの影響力が非常に大きいです。こうしたオールドカマーたちのコミュニティは規模が大きく、彼らの中では非常にある意味「慣

れた」対応ができています。しかし1980年代以降に来日したニューカマーの外国人、さらにいまなお増え続ける日本に来て間もない外国人たちと地域社会との関係を改めて考えていけ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ただ、私が今回の大震災の後で、非常に懸念している問題が一つあります。日本の震災後の復興の力そのものは、ここにいる皆さんもご存知だと思います。スローガンとしても「一つになろう、日本」とか、「一緒に頑張ろう」とか、目を見張るものがあつたと思います。しかしその一方で、やや心配になった事柄として、必ずしも正確な事実に基づかないデマとかメディアの情報が流れたことを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たとえば、3月の震災後の統計によると四十七万人もの外国人が、日本を出国したといえます。外国人による「出国ラッシュ」などといって成田空港の映像が繰り返し流されていましたが、それを見た日本人はどう感じるのだろうかという疑問も生じました。一部では、「都合が良い時だけ日本に出稼ぎにやってきて、都合が悪くなると、もう一目散に帰っていくのか」というような外国人イメージを強調するかのよう報道も目立ちました。そのようなナショナリスティックな見方を呼び起こすようなメディアの伝え方に危惧を抱きました。またこれも実際あったことですが、東北地方では、地震や津波や原発事故のあと、多くの人たちが家を空けている状態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が、そのときに「中国人窃盗団が暴れている」「強盗や強姦を行なっている」という、全く根拠のないようなデマが流れ、チェーン・メールやツイッターなどで関東にいる人達にも届きました。さらにこのメールは「今すぐ10人の友達に送らないといけません」というような内容だったのです。ここで想起されたのは、1923年の関東大震災の後、やはりこういったデマにより非常に残念なことですが、朝鮮人や中国人が何の根拠もなく、虐殺されてしまったという歴史です。やはりこのような危機的な事態に瀕すると、日頃の日本社会へのもやもやとした、漠然とした不安感とか恐怖感とか、突如として排外主義やナショナリズムへと転化していくこと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今回の大震災では海外から中国を含め非常に多くの各国の人々が日本を助けて下さったことに対しては、日本人の側も感謝を示していた一方で、日本の中で生活していた外国人に対しては、このような見方や反応が出てしまうこと自体非常に深刻な問題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ます。

近年、日本の多くの自治体、地域社会、学校などでは、「多文化社会」や「共生社会」を実現させようとする機運は盛んになっています。しかし、その内実はどういうものなのかは、あまりはつきりしたものではなく、個人的にはややスローガン化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印象を持っています。これからの社会では、いかに「私たち」「われわれ」というような自意識、また「コミュニティ意識」を共有、実感できるのか、そのことがとても大切になっ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そもそも「コミュニティ」メンバーは一体誰なのか、そして「日本人」とは誰かという問いにもつながります。多文化化が進む現在では日本人の「境界」が非常に広がっていますし、地域社会のメンバーは誰なのか、地域社会と日本との関わりが、具体的にどのような点に求められるのかが問われています。共同体における

連帯性をどう確立するかという問題に繋が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これらの問題を特に震災後の外国人のコミュニティとかネットワークと日本社会、また自治体との関係から、検証することが重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えます。同時に、社会学者としては、やはり私たちが当たり前に捉えてきた「社会」というものの定義や概念そのものを再検証し再定義すること、こうしたことも我々の使命ではないかと個人的には考えております。

宋金文：

下面我来说几句。我是学社会学的，最开始对地震感兴趣，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由于大地震发生以后，我们国内对日本的防震救灾经验非常感兴趣，但是又没有系统的介绍，所以我们就跟清华大学城市设计研究院把日本的防震经验，就是刚才那本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给翻译出来了，在国内出版。后来我们又有机会，就是日本阪神大地震以后，日本学者对阪神大地震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这个成果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国家在地震研究方面有很多的积累，但是，日本的地震，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经验还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又把阪神大地震以后日本的对策，包括他们的先进的经验，进行了翻译和出版。后来汶川大地震以后，我也去汶川进行过调查，考察，这次就非常高兴有机会能跟中日学者讨论日本3·11大地震以后的问题。

我要谈的问题是受灾者的生活援助的中日比较。大家都知道，地震发生以后有大批的受灾者，那么中国和日本，在受灾者的援助方面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日本的做法和中国做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这里面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和机制呢？我想谈这个问题。

从宏观上来讲，我认为受灾者的生活援助，实际上有很多层面，但是，最关键的一条就是重建资金的来源问题。任何的生活恢复都要从住房开始，从生活设施开始，从疗伤开始，从日常生活开始。地震发生以后，家庭的所有财产，尤其是大地震以后，大部分都损失殆尽，那么这个时候，尤其是大地震以后，需要大规模的援助，钱从哪来？我认为，在中国和日本，可以说在现在社会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这个钱的来源有三部分，第一个是“公”，第二个是“共”，第三个是“私”。“公”呢，就是国家和政府的援助；“共”，就是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社会捐助；“私”，就是靠自己亲朋邻居，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援助。那么这个做法呢，不同国家很不一样，或者说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今天主要谈谈中日双方在这个方面的差异，或说各自的特点。

首先，在这个“公”，国家和政府的援助方面，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是做得很好的。政府的投资力度很大，措施得力，迅速有效地筹集了很大一笔资金，解决了抢险救灾以及恢复重建所必要的资金问题。这样，使得灾后灾区的经济重建有了一个强大的经济支持。这点我认为中国政府是做的很好的。包括美国，日本等好多发达国家，可能都没有我们这样迅速有效地筹集大量资金的能力。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羡慕我们的中国地方。

从这个角度看，3·11大地震以后，日本对受灾者的援助，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尤其是从财政的方面来看，不是特别得力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日本的财政问题。因为日

本财政困难，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援助受灾者，所以这方面也是导致到现在为止，大家对日本政府救援缓慢，持批评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政府不是不想救，不是不愿开展工作，而问题是它的财政没有那么大，对灾区进行大的救助。而且，它有法律的约束，也不可能很快地筹集到资金。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点，跟日本相比，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总体来看，我们国内的看法是日本救援缓慢。为什么缓慢呢？我觉得资金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个层次是公共的“共”，就是从大家合力、协力这个方面来看，那么，中国方面，汶川大地震以后，我们社会团体和个人捐款的力度非常大，规模空前。有一个统计数字说，我们这次的“共”方面的捐款已经达到了 760 多个亿（人民币）。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而且这规模之大相当惊人，社会团体能捐这么多钱。这也是我们国家汶川大地震以后新的一个现象。以前，这种现象也很少，值得让人关注。但是由于分配体制不是特别健全的问题，那么这些钱是怎么使用的，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有关这方面，我也查了，我想查找一些具体的使用分配方式，以及这个费用是怎么落实的，这个方面没有一个很详细的数据，所以我现在还没有了解到这个钱，这 760 亿社会捐助是怎么使用的。

从日本的角度来讲，日本实际上，社会团体和个人，每次大地震以后，尤其阪神大地震以后，这个社会捐助的声势非常浩大。但是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它的声势大，但是能力并不是特别强。大家都愿意捐款，造势很大，但是它的实际筹款能力不是特别高的。有一个例子，就是阪神大地震发生以后，每个受灾者家庭从灾害恢复基金里面得来的钱只有 40 万。这个社会捐款，虽然是全国上下都很协力，但实际上数目不是特别大，40 万日元在日本干不了太多事情，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和日本相比，共的方面，我们国家有不足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地震保险很少。汶川大地震以后，有一个统计，参加地震保险的人很少，非常少。地震保险，是平时大家为了防止地震，然后大家共同出资形成了一个保险，当灾害发生以后，保险给予个人补偿。这是一种共助的方式，大家一起合力，来解决灾后生活的一个方式。那么，中国这个方面做的不是特别好，而日本这个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它这个地震援助，地震保险理赔，地震保险参加的数量比我们中国大的多。这个跟日本的地震多，经常频发是有关系的。所以它在财产保险方面比我们做的好，从这个角度讲，日本人还是挺注重社会共助这一部分的。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日本对生活的援助，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以前他们也没有对具体的个人受灾以后补偿的法律制度。阪神大地震以后，他们出台了一个受灾者生活援助制度。这是一个新的制度，对受灾者进行援助。但是，它的援助是有限制的。一个是援助的金额不是特别多，一般是 300 万日元。而且有使用限制，可以用于危房的修建，家具的购买，以及相关设施的购买，但是建房本身不能用这笔钱。就是发给你的钱，你不能用于个人的建房使用。这是它的补偿制度的一个特点。那么，它为什么属于“共”的部分呢？这要看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它平时是通过大家的捐款，以及自治体节约下来的钱，放到基金里面。当发生灾害以后，用这部分，大家平时攒下来的钱，来资助个人。所以它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与这个相比，我们国家在生活援助者的援助上，实际上这次做的也是非常好。那么，我们国家在汶川大地震以后对生活的援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死亡者的抚恤金和受伤人员的治疗。我们这次是死亡了八万多人。每个死亡者是按 5000 元的标准发放的。治疗的时候，基本上前期是免费，后来有公费医疗的话，就可以接受公费医疗，没有公费医疗的人，如果受伤以后，那么你也可以通过社会捐款的部分，给予及时治疗。这是一个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另外就是财产补偿，我们国家也做得很好。刚才，伍国春老师也讲到农村建房的问题，说农村的建房存在很大问题，一个是房屋本身建得不结实。另外从建设的恢复成绩来看的话，尤其是偏远农村的建房建得不是特别好，那么从国家制度上来讲，实际上是每户给的是一万块钱，这个力度是比日本要大得多。因为日本它对建房本身是不提供援助的，因为建房是私有财产，不能提供援助，而中国实际上在这块做得比日本好，是一万元，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些补助，就是社会捐款的一部分也可以用于住房的建设。另外，对受灾者的生活基本保障，这个方面我们国家也是做的可以的。尤其是地震三个月以后。三个月之内，每个人每天发十块钱一斤粮食，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稳定。另外，对一些受灾者实施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等等，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所以我们国家，发生汶川大地震，这么一个大范围的灾害，没有饿死，没有因灾害得不到援助而死的人。这些方面，也说明我们对受灾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做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后续的问题就比较多了。当国家、社会或志愿者提供的援助结束以后，也就是恢复完成以后的生活，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有很多问题。刚才的伍国春老师也讲过，尤其是在大地震以后，房屋重建这方面，虽然由国家拨款，但实际上呢，大部分还是靠亲戚朋友或银行借款贷款，灾区缺钱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去考察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谈到这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的生活的所有设施都没有了，所有生活用品都没有了，要维持日常生活没有钱。又没有工作，因为当地震灾害发生以后很多人失业，这样的话，他们生活很困难，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怎么样建立一个受灾者援助制度，而且使这个制度长期化是中日双方共同的一个课题。

然后，我在看相关材料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国家实际上在受灾者援助方面，很多受灾者是依靠亲属朋友邻居等社会关系，来维持灾后的生活的。因为他们一无所有，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从制度上来看，日本也有社会援助和社会救助，但是主要是靠自身的力量。因为相比来说，中国经济水平低，所以个人筹资能力比较差，虽然有亲戚朋友的帮助，但是实际上，自己恢复重建的能力还是比较差的。但是日本，相对来讲，经济比较发达，自己恢复的能力要比中国要强。实际上现在日本也有收入差距和阶层的差距。很多没有收入的老年人，发生地震以后，他们也没法自己恢复自己的生活重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两国也有很多共同的问题。这个在阪神大地震后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最后搬出避难所或临时住宅的人，都是一些没有钱的，贫困的人，老年人或是单亲家庭这种人。很多有钱的人都很快地实现了住房的重建，生活的重建，就业等等。灾害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它影响的范围和方式是不一样的。这跟我们社会学的阶层划分是相关联的。

以上是在灾害发生后生活援助的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一些新的方法，一些现象。最后谈三点看法。第一点居民的权利观点发生了变化。过去就是等待政府的援助，是一种恩惠，“皇恩浩荡”。现在不是，现在认为救灾是政府的责任，老百姓应该得到这方面的利益保障。这

是生活援助方面观念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政府从这个角度上也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包括援助资金的使用方式等等。第二点，就是我实际上也发现，个人和我前面所讲的“公”“共”之前存在两种协作方式，一种是合作论，第二种是博弈论。一开始是合作的，大家都为了个人的生活恢复，齐心协力一起来帮助他克服很多困难。当灾害恢复到一定阶段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博弈论。就是个人受灾者怎么从国家和社会得到更多的东西。而国家和社会的援助是有限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博弈，包括分配不公的问题，政府官员的分配体制的问题，等等都会出现。这个是灾害后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和日本相比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汶川大地震以后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个人和公共团体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缺乏。老百姓自己想要的东西和政府给你的东西之间的沟通渠道是不通的。按照理想的模式是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尽量地满足，然后现在实际的问题就是，刚才大家也在谈这个问题，我们国家震后三个月之内，就出台了地震条例，三年之内完成地震恢复重建工作。那么这个是从上到下的制度安排。那么老百姓自己他们需要干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设计制度，我认为这一点日本做的比我们要好。日本为什么恢复重建时间长，看起来很缓慢，但是它的效果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它在个人灾害恢复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居民，受灾者，社区的意见，他们在任何的防灾规划以及灾后的重建过程中，有什么问题的话是大家一起讨论的，一起讨论的话就是时间很长。有很多矛盾和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予以化解。这样的话，社会矛盾不凸显，而且以后的进展会比较顺利，没有什么大的波澜，那我们国家一个是至上而下的，老百姓的沟通渠道不畅通，所以后面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有的人发达了，很快恢复了生活，而有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跟上整体恢复的步伐，落后了，这样就使得社会差距的问题扩大。我们都知道，地震发生之后，应该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使每个人都有进步和发展的空间，所以我有个提议，就是说我们中国应该注重居民生活保障的需求和中央以及公共支持之间的衔接的问题，而不是至上而下，而是至下而上的体制，这个我觉得应该像日本学习，这是我的看法。

首藤：それでは、長田先生、話題提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長田洋司：

はじめまして、私は現在、在上海日本国総領事館で働いております長田と申します。余り準備してこなかったのですが、これまでの先生方の大変素晴らしい発表を聞かせていただいた後で、非常に恥ずかしいのですが、今回こういう座談会を通して発言するチャンスを与え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とに感謝申し上げます。今回は、私が現在関心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それとまた今現在働いている職場で、この大地震を通して感じたこと経験したこと等を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それとともに、先ずは、今日本の政府機関に働いているものとして、今回の震災を通して、たくさんの中国の皆さんから励ましの言葉や様々な援助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とにつきまして、感謝の気持ちを表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私は約二年近く上海で働いておりまして、もちろん大震災が発生した時も日本におりませんでしたので、外国にいる日本人として、大震災を外から経験いたしました。発生した日、私は南京に出張しておりまして、実は日中交流イベントの真っ最中でした。私はイベントの仕事をやっております、最初に中国の上海メディアの方から電話が来まして、「今、日本で大変なことが起こっていること、知っているか？」と、日本で大地震が起こったことをそこで初めて知りました。その後、私と私の同僚たちは情報を聞いて非常に不安になりまして、先ずみんなが何をしたかといいますと、それぞれ自分の家族と連絡を取り始めました。しかし全然繋がりません。繋がらないのもっともっと不安になりました。私の家族とは、結局その日の夜中にやっと一本の電話が繋がりまして、その時に非常に自分の無力さ、こういう大災を前にしての無力さというのを痛切に感じたことを記憶しております。

次に私が現在関心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についてお話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現在私の職場では、中国のメディアについていろいろ新聞を見ながら、日本に対する反応とか、仕事としウォッチ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も、中国の一般の人々の日本に対する反応の変化について非常に関心を持っております。その観点から見ると、震災後、日本と中国の中で、マイナスの反応とプラスの両方の影響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先ずマイナスの部分の影響ですが、さきほど他の先生から、震災で急に外国人が帰国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話もあったんですが、日本に入って来る人が非常に少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観光実績が激減しました。これは日本の震災のあった地域だけじゃなく、全国的に観光面での影響が起こってしましまして、それが日本の経済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がありました。私も、知り合いの韓国の方から聞い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の方は今、日本にある会社で働いているのですが、地震が発生した途端、たくさんの一緒に働いていた韓国の方々が一気に帰国してしまって、職場がもう大変な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しかも、その問題はそこで終わらず、彼らは、再び帰って来たんですね。帰ってきて、またそこで働くことを希望したんですけども、今度は逆にその社長さんとか会社の方がですね、気分を変えてしまって、逆にもう受け入れませんと、拒否したんですね。こういうなんか相互の軋轢みたいのものがですね、日本で起こっ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を知りました。

また、もう一つのマイナスの影響というのが、いわゆる貿易関係ですね。食品の安全性も含めた貿易の問題ですね。先程、徐一平先生からも最初の話でお話されていましたが、今回地震だけではなくて、津波、そしてまた、今まだ続い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放射能漏れの問題が起きておりまして、それが海外に対して、非常に風評被害というものを生み出す要因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そして、その風評というもののものが、中国の中でいろいろな報道やいろいろな噂の形で出てきまして、それがいわゆる貿易の問題とか、食品安全の

問題とか、もちろん観光にも影響するんですけども、日本に大きな打撃を与えました。日本は非常に危ない国だというようなですね、印象を与える結果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また、当時、留学生の方がたくさん帰国したと聞いておりました、その後、留学生が帰ってこない、その留学生自身の方は別に帰ってもよかったという人が多かったようですが、親が引き留めて帰さないですとか行かせないですとか、そういった事例も聞いたりしました。そういった、そういう目に見えるマイナスの影響というのが、今、回復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はありますが、まだ問題というのが残っています。

しかし、その一方で、非常にプラスの影響というものが、実は、私は、もっと大きかったと感じております。一つは、今回地震に関する講座や日本を支援する、そういう政府レベルから草の根レベルまで、さまざまな動きが起きました。先ず、目に見える話で言いますと、義捐金や励ましのメッセージというのが、中国の皆さんから多数寄せられました。9月8日現在のデータですが、上海総領事館で受けた、それに関連する対応件数が累計で約2150件、義捐金受付件数が1437件でした。そして、受け付けた義捐金の額なんですが、人民元では2645万9086元、日本円でも1061万円以上が寄せられました。こうした義捐金は赤十字の方に責任を持ってお送りしているわけなんですが、こういった支援の輪というのが大変広がりました。また、非常にたくさんの義捐金が寄せられたのですけれども、もちろん企業単位で寄せられた義捐金もたくさんあったんですが、民間レベルの、例えば普通の一般企業に働く人やおそらく農村出身の収入レベルの低い方の数十元も含めてですね、大変多岐にわたる様々な支援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さらには、メッセージや励ましの絵といったものもたくさん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れらは日本でも報道されまして、日本人の中国に対するイメージにも良い影響を与えたと思いますし、こうした支援の輪が広がったという意味ですごくプラスの影響を与え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また、私は南京で文化交流イベントの仕事をしている時に、日本語カラオケ大会の時だったんですが、その時もですね、誰からとなく自然発生的に参加した学生達がですね、「日本頑張れ」というようなメッセージを発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さらには、中国のネット上での書き込みなんか見てもですね、それまでは、中々日本を応援するような書き込みは出しにくいという声もありますが、この震災以降ですね、「日本頑張れ」という内容の書き込みが目立ちました。「四川大地震の時は私たちを助けてくれたので、今回は私たちが日本を助ける番だ」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ような、私たちが大変励まされるようなメッセージを多数いただきました。もちろん政府レベルでも様々な援助を、救援隊や救援物資を送っていただいたことももちろんですし、胡錦濤国家主席を始め、中国政府の上のレベルの方々も在中国大使館等に慰問にいらっしゃったりとかですね、日中間がの雰囲気、非常に良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感じております。

また、それと同時に、日本で震災復興が始まると、現場の人たちは非常に秩序を持って動いているとかですね、皆が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て復興に向けて頑張っ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記事も、中国のメディアで紹介されております。こういうような事例を踏まえてですね、

様々な良い影響を日中がお互いに与え合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感じたところです。私は、今回の震災を通してですね、大きな災害では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こういった大きな災害を通して日中がお互いに助け合い、またお互いに理解し合って、また評価をし直すという、そういう機会がまた生まれ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風に感じました。

私は、先程、自分の感心として、震災を通しての日本と中国での反応、またその変化というものに興味があるという風に申し上げたのですけれども、そこからもっと踏み込んでですね、中国の民間レベル、「社区」を始めコミュニティですとか、そういった基層レベルでの日本に対する印象の変化や相互行為の可能性というところまで、自分の研究を進めていければという風に考えており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申し上げます。

宋金文：有请语言大学的文俊老师

文俊：

大家好！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文俊，我也不是专门研究地震的。我跟伍老师都是名大毕业的，而且以前在名大也受到过西原老师的关照。我研究的是传媒和女性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一次的大地震，我可能也是比较关注其中的传媒的问题，以及其中的女性视点的问题。刚才长田先生也提到了许多相关的问题。但是我这次关注的，其实可能跟大家的有所不同。因为大家比较关注的可能是日本国内重建的问题，而我从一个在中国的日语教育者的立场出发，我可能比较关注在日本怎么进行日本震后的经济方面的复兴之外，怎么在海外重新建立自己的形象的问题。或者说也把它算成是一种日本的重建，在海外的一种重建。因为我觉得日本的经济已经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以内的问题，在这个国际化的时代，它在各个领域跟海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比如说教育这一块，就是中日交流，那么我们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交流项目就是留学生问题对吧？但是这次的日本地震，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核泄漏的问题，那个核电站爆炸的问题。因此，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招生，我想这种影响是存在的。因为就我们北京语言大学整体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当时发生地震之后，当然是我们作为日语学习者来说会觉得非常痛心，想办法展开了各种募捐活动，想尽一切的努力帮上忙。但是同时呢，其中也影响到了中国学生留学的问题。我们有跟日本大学的交换留学生的名额，已经定好去留学的学生，学生本人也特别想去，但是家长却不同意了。本来要成行的结果取消成行，以及本来将在下一年度成行的，但是最后也取消成行，就有这么一种现象。这是其中影响到留学的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就是我们的招生，因为我们面向全国招生，不是留学生招生，就是日语院系的学生招生。它分为两块，一块只是在国内进行学习和日语的专业训练，毕业后可能就就业了，中间一些优秀的学生可能获得交换留学的机会。但是另一块就是跟日本的各个大学之间保持一种联系，我们合作来培养学生。我想日研中心受到的影响可能会稍微小一点，但是像我们这种普通院校的话，就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有 2+2 班，我们系 2+2 班本来在去年已经由以前的一个班增加到两个班，但是呢，尽管今年也努力招生，但是还是发生了一定的生源上的滑坡，就是这个人员数量的降低。比如说我们去年是 50 名学生，那么

现在就是没有招满 50 名，而是降到了 37 名，降幅还是挺大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把它分成两个班，这就是在影响到我们日语教育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也不完全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减少了，对我们的日语教育可能有影响。我想得更远一些，我觉得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个影响，还是跟信息传播是有关系的，这回我想要谈到的就是媒体研究与信息传播方面。因为每个国家的视点不一样，中国的媒体进行信息传播的时候，它的关注点也是不一样的，它也许会更多的关注比如说日本的经济受到的影响和由此造成的对我们中国的影响，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关注点。当然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核问题。可能作为政府它会比较关注这两个问题，并且在媒体上有一定的反映，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可能相对来说会忽视一点，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風評被害”。这个“風評被害”不仅仅是抢购盐这件事这么简单，我觉得啊，抢购盐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它还表现在很多层面，其中就包括了影响我们学生对留学日本的意识的问题。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二年级有一个学生，现在她已经上三年级了，有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她以前就有一个志向，她说：“日语只是我的工具，三年级的时候我要去日本留学，我要去学习设计。”她喜欢设计，但是得知日本发生这个情况之后，她一下子就慌乱了。她说：“我的人生该怎么办？”因为她自己已经设定了这样一个人生目标，但忽然一下子就觉得，哎呀我该怎么办。就有这个问题。但是这只是一种表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信息差的问题。我认为这个信息的差异肯定在各个层面都会产生的，不论在日本、日本的公共机构以及日本的民间机构之间还是个人之间，肯定会存在信息差的问题。那我觉得，应该怎么来弥补这个信息差，其实是做这个传媒或者说，甚至我觉得作为日本大使馆，或者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方面，我还没做过对大使馆的采访，也没有来得及做，因为当时提到要做这个研讨会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但是我查过大使馆的对外媒体。比如说它的网页，它的网页也的确做了很多对外的宣传，它有一个关于日本大地震的专页，基本上重要信息都是关于日本大地震的问题。但是我们进入各个链接会发现，它只有一部分内容是翻译成中文的。而且这部分翻译成中文的内容，都是直接从针对日本民众所做的宣传翻译过来的文字。比如说这个核能的安全问题，我们日常生活中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些信息都不是针对国外受众制作的，甚至也不是针对和日本有一定经济合作关系的这部分民众做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作为日本大使馆应该努力地一个方向。因为其实日本大使馆在这个时刻已经可以成为日本在国外的一个“意见领袖”，产生了这样一个作用。我觉得在这方面它不应该完全期待于外国的“意见领袖”。比如说，我记得当时是咱们北京的高校有 100 个专家联名提出我们要支援日本。在这个方面日本应该怎样作出更多的努力，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可以研究的方向，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当然，日本大使馆现在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说它开了一个微博，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拥有了大概 8 万多粉丝。但是呢，真正保持中日间的联系，怎样恢复这种联系，怎样重建这种联系，它在这方面所提供的信息相对来说比较少。而且，有些它给出的链接，我曾经去确认过，是无法打开或者是因为网络安全问题根本没法进入下面一层网页，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日本方面确认的一些问题，这就是我目前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听到各位老师的发言，我同时还想到其他几个问题，请允许我再讲一两分钟。其中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才是真正的复兴和

重建の問題。刚才各位老师都提到了复兴和重建，比如说刚才首藤老师就谈到震灾以后的“孤独死”，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也许我们在物质层面进行了非常完美的重建，但是在精神层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伤痕”，很多的这种后患在里面。联系到我们中国的震后重建，我个人没有去过汶川现场考察，但是我们也曾派出学生去考察重建后的汶川地区。其中就有一个反映是，政府的的确是投入了大量资金帮助他们（灾区人民）重建生活，其中重建的最快捷的一个方式就是建设农家乐，它是以农家乐的方式重建了。但是呢，从个人的心理来说，它并没有恢复到他自己期望的以前的，比如说他有一块地，他随便种什么东西他都能安全地食用，以前的人际关系这方面的重建也没有得到再进一步的确立。可能这个就是在灾后重建之后长期以来政府更加需要下功夫做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最后我讲一点就是在中国所有的关于震灾的研究当中，比如说伍老师她现在做的这个志愿者的研究，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以前一直没人关注这一点，但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志愿者的活动，尤其在震灾当中的志愿者的活动问题，我觉得在日本这方面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的展开。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其实还需要一种，从女性的视点进行救灾及灾后重建的研究。在这一点可能日本稍微走到了前面一点，它从90年代就已经在开始相关的研究，并且关注这些女性视点怎样反映在国家的条例的制定当中。今后也将成为我自身的一个研究方向，在这个方面我可能会更关注一些。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

首藤明和：それでは、出和先生、話題提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出和暁子：

南開大学外国語学院の出和暁子と申します。この9月で中国に来てちょうど十年目になります。日本を離れて十年になるとも言えるのですが、日本の生の社会について少し不案内になりつつあります。でも、普段は日本にいる家族や友人、そしてメディアなどから情報を得ています。現在は、インターネットなどの通信手段が便利になりましたから。

私の故郷は、日本の中部に位置する石川県金沢市にあります。幸い、今回の東日本大震災では直接、大きな被害は受けませんでした。また、1995年に起きた阪神・淡路大震災の時は、私は東京にいましたので、この時も直接、地震を体験していません。新潟中越地震や能登半島沖地震が起きた時も中国にいました。だから、私自身、自ら地震による被災を体験した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この度の東日本大震災に際して、私は中国にしながら、日本のために何かできないかという思いがありました。でも、実際に行動に移したことと言えば、大使館を通じて義捐金を送ったくらいです。先ほど、西原先生がご紹介された北京在住の日本の女性たちが、日本にいらなくても様々な形でいろいろな活動をなされているとの話をお聞きして、少々恥ずかしい思いです。本日、この座談会には過去の震災において、そして今回の震災の被災地まで足を運び、調査研究や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などをしたことのある先生方がいらっやっています。先生方の豊かな知識や経験、そして研究成果をお聞きして、勉強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また、今回の座談会に参加させていた

いただいたことは私にとってとても良い機会です。これを機に、私自身がこれからできること、なすべきこと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今、申し上げましたように、私は震災の実体験がなく、また、実際に被災地に入って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を行ったり或いは調査を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ので、今日お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は、主にメディアや書籍などを通して得たものです。私は今までずっと社会学、福祉学の視点からお年寄りをテーマとして研究してきました。今回の座談会への出席のお話をいただいた際、本会の「東日本大震災とその後の新たな社会への模索―日中比較」というテーマにどのような視点から見ていけるのかについて考えました。

この度の東日本大震災が起きた地域というのは、過疎化が進み、同時に少子高齢化が非常に進行している地域です。そして、今回、被災した人々の大半がお年寄りだったというふうに聞いています。この9月で、震災から半年が過ぎましたが、私が聞いたNHKニュースでは、現在、被災地において若者の間で問題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と、お年寄りの間で問題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に違いが見られるとのこと。若者においては「仕事が見つけられない」という悩みが一番多かったのに対して、お年寄りの場合は「生きがいが見出せない」との回答が多かったと言います。具体的には、「今までやっていた菜園や庭いじりができない」ためにストレスを抱えていたり、また、仮設住宅での生活において「コミュニティの維持が困難」であったり、「お年寄りの見守りが困難」であるといった問題が出始めているとのこと。

そこで、まず、私は、どのようにしたら、被災したお年寄りたちの失ってしまった生きがいを少しでも取り戻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か、考えていきたいと思えます。先ほど、首藤先生もご指摘なされたように、今回の東日本大地震は阪神・淡路大地震とは異なり、農村で起きた「農村型」の震災でありました。よって、「都市型」の震災であった阪神・淡路大震災での経験や教訓も勿論、生かせる場所はあると思えますが、「山村型」地震と言われる中越地震での経験や教訓を東日本大震災の復興過程において生か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ます。冒頭でも述べましたように、東日本大震災で被災したお年寄りが人生に生きがいを見出せない原因の一つとしてあげているのは、「野菜や草花を植えるといった今までの日常生活でしていた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た。中越震災後の復興過程においても同じように生きがいを見失ってしまったお年寄りの問題が浮上したそうです。このようなお年寄りのために「農園づくり」ができる環境を提供したことによって、不安や悩みを解消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いう成功事例があります。それから、阪神・淡路大震災後の復興過程において形成され、高く評価された「見守りシステム」があります。これは、一人暮らしのお年寄りを地域で見守っていくというものです。これらの成功事例は、過去の震災を通して得た積極的に取り入れていける経験・教訓だと思います。

一方で、反省し、よりいっそう考え、取り組んでいくべき課題もあります。先ほど首藤先生がおっしゃいましたように、阪神・淡路大震災後の復興過程において「お年寄りの孤独死」という問題が出ました。最新のデータによりますと、16年間で孤独死をした人は

900人を越えています。そのうち七～八割が65歳以上のお年寄りであると言われて
います。

また、現在、私は中国にいますので、2008年に起きた汶川大地震での復興過程におい
て、被災したお年寄りにはどのような問題があったのか、そして、それに対しどのよう
な支援を行ったのかについても見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先ほど、伍先生がおっしゃいま
したが、実際に被災地へ行くと“面子恢复重建”、つまり都市部の沿線には建物や主要道路
が出来上がりあたかも全てが復興したように見えたとしても、ひとたび農村部の路地に入
ると、現地の人々は依然として臨時のテントに住んでいるといった問題があると述べられ
ました。そして、宋先生もご指摘なされたように、復興ビジョンを進めるにあたっては、
やはり社会的弱者と言われる人たちの存在を軽視し、彼らを取り残されるような復興のや
り方は、根本的に社会を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した。私もこの考え方に賛成します。

私は、社会的弱者を社会的に包摂するといった視点に立って、日本と中国における過去
の大震災における経験や教訓を通じて、このたびの東日本大震災によって、生きがいを見
失っているお年寄り、そして、お年寄りだけでなく、同じように社会的弱者であり災害弱
者でもある障害を持った人々に対しても焦点をあてて、どのような支援をしていかなけれ
ばならないのか、どのような支援をしていけるのかを考え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しかし、
私の視点はまだまだ浅く、狭いものです。今回、先生方の発表をお聞きしまして、非常
に広く大きな視点から見られていると感じました。このたびの座談会でいろいろと勉強な
りましたので、自分自身引き続き考え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以上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宋金文：最后请我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周维宏老师做个总结发言。

周维宏：

我是日本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室的周维宏。谈不上最后发言和总结、是以一个普通
发言者的身份。第一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也不会多说什么以免耽误大家吃饭的时间，我就
补充几点。有一点就是我们中心社会专业和灾害研究的关联。大家刚才已经听到了很多老师
的发言，第二点就是，我想给大家提一点意见。因为我参加了很多会议，都非常喜欢那种有
讨论的研讨会。如果这个研讨会没有讨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失败的会议。只是报告完了
如果没有任何议论的话，我觉得那就不叫研讨会，叫报告会还过得去。所以时间有限，我在
这方面再说两句。如果有时间就讨论讨论，没有时间的话就作为一个意识大家还可以私下交
流。”

第一点补充一下刚才宋老师提到的我们跟灾害研究关联的部分。灾难研究在中心过去没
有，我和宋老师是这个社会研究室的创立者。我们俩都是从事农村社会研究的，尤其是日本
和中国的比较。灾害社会学主要是受大矢根老师的影响，我们也是看着大矢根老师成长起来。
也许他也象征着日本灾害社会学的快速发展的一个过程。90年代他第一次到中心的时候，还

是一个非常勤讲师，博士刚刚毕业。他是从云仙火山喷发开始研究灾害社会学，在中心也授过课。阪神大地震的时候他作为自愿者也亲自跑到现场做了很多调查。当时我也正好在日本一年，经历了两大事件。一个是奥姆真理教的毒气事件，还有一个就是阪神大地震。当时我在东京，没有在阪神地区。当时他做了很多研究，跟我们有很多交流。最近一次，他是在3.11地震发生之后一个月，有机会到中国来，就马上到我们中心来，为我们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做了一个报告，主要是日本地震灾后研究做了一个交流。现在大矢根老师应该说已经是专修大学的正式教授，是日本灾害社会学的骨干之一。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专家了，写了很多有关灾害社会学的书。在他的影响下呢，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年马上有一个毕业不久的硕士生被京都大学地震研究所吸收为国费的专门研究地震的留学生，马上就要去日本了。这是我们第一个正式到日本专门去研究地震灾害的。他的硕士论文做的就是刚才有很多老师提到的先期灾区重建计划议案的一种日本的最新思维。灾区重建不是要等到灾难发生以后才会去研究考虑，而是还没发生灾难但将来可能发生灾难的所有的村町市都要做一些相应的重建计划的研究，不是救灾计划而是重建计划的研究。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做这方面的课题，跟京都大学地震研究所的导师合作。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现在我们硕士论文的选题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同学往灾害社会学或者环境社会学这方面步入。还有一些学生，如王亚南，这是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做的是“八ッ場ダム”，现在的一个很受争论的大坝重建的问题。上届也有一个同学做的很不错，做的也是关于高速铁路、原子能发电站和水坝这些引起争议的社会学研究。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将来在我们社会专业可能会有更多同学朝着环境社会学和灾害社会学方面发展。那么下学期我们中方要请日本环境社会学会的会长，也是关西学院大学的教授古川彰老师来做集中讲义，可能会推动我们在环境社会学和灾害社会学方面的发展。这要感谢日本社会学界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包括今天有两位名古屋大学毕业的社会学专业的学生，现在已经是研究日本灾害和环境方面的骨干了。西原老师可能是她们过去的指导老师，今天在场能看到我们学生的成长。”

最后我就回到提问环节，由于时间关系，我不给所有代表提问只给两个首位做报告的中日双方的主宾，提一点小问题。一个就是刚才高先生的报告很精彩，但他代表的是一种从自然科学方面来研究灾害学的最新动态。在这上面我觉得高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把中国对灾害的整个对策就是力量的投放比例用圆图的形状计算出来。他的观点就是把前面的预防部分扩大，而现在的防灾和重建的部分比较大。但是现在我就想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我觉得这个圈还是小了一点，就是灾前预防的那个。好像跟预报，防跟预这个研究差不多。然后灾后重建还是最大一块。根据我跟日本灾害社会学或者在日本呆了一段时间的经历我觉得日本的一个特色就是无论它发生多大规模的灾害或者什么类型的灾害，就是刚才伍国春老师也得出这个印象，这更加印证了我的想法。就是它的人员损失总是最小的，东京沙林毒气那么大一个事件，最后统计的直接死亡人数才12个。当然有好多人受伤了，有几千人到医院去了但都没出什么大事。阪神大地震那么大一个地震最后死亡人数也才几千人，五千人以下。不像我们中国动辄就要上万，几十万这样一个结果。有人说是中国的国土太大人口太多，一出事就是国际级的。但是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包括制度性当然也有管理

学方面的问题。所以研究灾害可能有经济学或者是管理学的当然首先是自然科学的各方面的研究来决出。那么社会学也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在人的因素方面，对待灾害的意识方面，我们跟日本到底有什么差距。在经济学或者在管理学上，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时候的那些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可能都有很大的落差。才使得每次发生同样一个灾害，甚至于日本的灾害规模比我们大。但是我们的死亡损失都要比日本重的多得多。这个应该是我们所有研究灾害的尤其是中日灾害研究交流方面的重点要考虑的一个课题。怎么样学学日本的经验，使得我们中国将来也能达到这个水平。就是不管是9级地震还是10级地震我们死亡人数都是以个位数或十位数来统计的，而不是动辄就是几万几十万的人员伤亡。这是我们的一个共同想法。刚才高先生的我想提出的一个小问题就是说，现在在自然科学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说一种认为地震是不可预报的，所以在对策里边应该把更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防灾建设上。所以是不是可以把第一个圆画的跟现在这个重建圆圈差不多大小。我想以后私下听听高老师对这方面的看法，就是说地震是不是可以预报，是不是在投入的比例上把大量的投入投到预报地震上，还是说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到事先防灾的所有努力当中去，这是个小问题。另外就是陈老师的，我觉得那个问题更小了，就是一个翻译的问题。陈老师当时亮出了一个词，就是“逆機能”。这个的原文就是英文的“disfunction”。“disfunction”我们通常可以翻译成功能障碍。所以这个词有个特别的含义，如果有机会您再给我们解释解释。一般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因素使得这个功能失去了功能，但是是不是意味着向另一个方向去反作用呢。好像通常的词汇 disfunction 里面没有这个概念，通常翻译成功能障碍。就是本来应该正常的发挥功能，但是因为种种因素发挥不出这个功能，这不可能是个翻译上面的漏洞。如果里面包含了您的一些新的想法，那么再交流，谢谢。

首藤明和：

「本来なら、これから議論を始めるところなのですが、予定の時間も超えており、もう時間がございません。そこで司会者2人から今後のシンポジウムの方向性やテーマについてお話しして、まとめに代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ず、本日の会議では、日中双方での震災経験の共有が図られました。そして、今後、日本と中国は、災害救助・復興・防災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なことができるのか、このことを考えるためのヒントが多く提起されたと思います。それぞれの問題意識を発表し合うことで、いろいろな課題や可能性があることを確認できました。例えば、王志秋先生や西原先生の話題提供の中にありましたけれども、まさしく人類普遍の価値、生命とか〈生〉といった普遍的な価値の中で、日中双方のお互いの長所を引き出していく、そういった新しい時代になってき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あるいは、そう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う意味でも、やはり歴史や文化は大変重要です。例えば、今回の東日本大震災のように東北地方太平洋沖に震源を持った地震ですが、1896年や1933年にも2度にわたって発生しています。1896年の地震と津波の時は、釜石という町で全人口の53.5%の人が亡くなりました。1933年の同規模の地震では、釜石で亡くなったり行方不明になったりした人は全人口の1.3%でした（玄田有史「釜石の火は消えない」

『文藝春秋』2011年6月号)。つまり、2度の地震の間では、自分たちの両親や地域の人びとが経験したことをしっかりと受けついで、1933年の地震では、その教訓が生かされたと聞いています。ところが、1995年に起こった阪神淡路大震災と2011年に起こった今回の東日本大震災では、もちろん単純には比較できませんが、釜石でかつて経験したこととはずいぶん異なった結果が生じています。科学技術や専門家システムが張り巡らされた現代社会ではありますが、私たちはやはり、社会のあり方を考え直す時期に来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それから、例えば高建国先生のお話にもありましたように、中国でも正確な地震予知を実現しています。おそらくこうした地震予知の技術は、中国の歴史や文化に根付いた知見と科学技術との混成のなかで練り上げられた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あるいは、王志秋先生が話された国際救援活動について、ここにも、おそらく中国の歴史や文化にルーツをもった特徴的な救援方法が多く含まれていることでしょう。一方、日本が最も得意とする災害救助の蓄積も数多くあるはずです。つまり、歴史や文化にルーツを持ちながら、科学技術との混成の中で形成されてきた災害救助・復興・防災の理論や方法について、お互いの長所を生かす中で、領域によっては国際間での分業も含みながら、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な協力体制を築いていくことは今後の重要な課題のひとつだと思います。」

宋金文：

向历史学习，向我们直面的现实中获取的经验学习，这是我们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比方说，可能在受灾地区他们有的人就连听都没听说过还有个龙门山断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灾害知识这方面没有得到宣传。专家们都知道，但是老百姓不知道。所以这方面向现实学习，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知识让人们都知道，向历史学习避免让灾害重复发生，这也是我们研讨会的一个目标。今天呢，会议的这个设计有问题，本来应该有一个讨论的时间，这个讨论我也是非常期待的，可是没有实施的了。这一点呢，我和首藤老师作为一个司会者先作一个自我反省和批评吧。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讨论还是非常有成果的。

虽然讨论时间没有了，但今天各位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视角和一些问题。比方说，关于如何建立职业信赖关系，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职业职守，以及国际救援合作应如何开展；还有比方说外国人的救援工作和它的特点，农村住房建设和改善的问题，多层人际关系的建立问题；还有就是灾害发生以后各国人民的反应以及信息传播的特点和应该注意的事项，老年人和生活弱者的生活重建的问题；还有生活者救灾援助体制的问题等等。地震是自然现象，但是这些问题都是由地震引发的社会现象。所以我们这个研讨会和中日社会学会一起做，它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是跟其他自然科学的研讨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些问题，今天只是个开始，我们希望而且我们已经有个预案，以后还会继续这方面的一些探讨。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